

1 天主教會

導言

天主教會的中文聖經

一、元代天主教的嘗試

1. 早期記載

中國天主教的歷史，始自十三世紀的元朝時期。雖然天主教的中文聖經翻譯，現存文獻的起始是在明代，但在歷史中卻遺留了元代天主教譯經的記錄。¹

一二四五年（元太宗十七年），當蒙古大軍進逼歐洲之際，羅馬教廷和法國國王分別派遣方濟會士，於四月十六日復活節奉教宗諾森四世（Innocent IV, c.1195-1254）之命，從法國里昂啟程，到蒙古的和林聘問。

和林（Karakorum，也稱「哈拉和林」）位於今蒙古國境內前杭愛省西北角，蒙古人在一二二〇年遷都至此。方濟會士柏朗嘉賓（Giovanni da Pianò Carpine, c.1180-1252）是這次行程的主要成員，另有波蘭人本篤（Benedictus）充任翻譯，同行者還有波西米亞人司提反（Stephen）修士。司提反修士其

1. 關於天主教中文譯經，參 Von P. Bernward Willeke, "Das Werden der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el", in Johannes Beckmann, *Die Heilige Schrift in den katholischen Missionen: Gesammelte Aufsätze* (Schoneck-Beckenried: Admin. der Neue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66), pp. 124-138; 《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簡史》（香港：聖經協會，1991）；Piet Rijks, "The History of the Bible in China", 載《聖言之僕：陳維統神父晉鐸金禧紀念文集》（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6），頁 3-50；Nicolas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Irene Eber, Sze-kar Wan & Knut Wolf (eds.),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gustin - Nettetal: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31-54；蔡錦圖，〈天主教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和版本〉，載《天主教研究學報》2（2011），頁 11-44；Daniel K. T. Choi (蔡錦圖) & George K. W. Mak (麥金華), "Catholic Bible Transl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 Overview", in Cindy Yik-yi Chu (ed.), *Catholicism in China, 1900-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ur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105-123。

實未經教宗指派，而且中途因病而返。故此，實際上前往蒙古的只有二人。柏朗嘉賓經過乞瓦（Kiev，今基輔），於一二四六年四月四日到達伏爾加河畔的西蒙古拔都之地。四月八日復活節，拔都派人護送柏朗嘉賓前往和林。七月二十二日，他們抵達和林附近的昔刺斡耳朵，八月二十四日抵達和林。

當柏郎嘉賓到達和林時，正值元定宗貴由即位蒙古帝國大汗。柏朗嘉賓向貴由呈上教宗的書信，勸蒙古大汗率臣民成為天主教徒，並罷兵息戰。貴由卻用波斯語回信，要求教宗和其他歐洲君主向蒙古臣服（這封信至今還保存在梵蒂岡）。柏朗嘉賓向貴由呈上教宗文書後，無功而還，於一二四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離開和林，翌年五月九日重抵拔都幕帳，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里昂。

柏朗嘉賓在回國後，以拉丁文撰寫了一部《蒙古行紀》（*L'Ystoria Mongalorum*）的著述，是歐洲最早對蒙古的記述。書中除了敘述其經歷外，還描述蒙古人的戰爭策略、征服地區、武器裝備、風土人情等，並提出如何同蒙古人作戰，成為研究當時東西交通及蒙古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²

在不久之後的一二五三年（元憲宗三年），佛蘭芒方濟會士魯布魯克（Guillaum de Rubruquis, c.1215-1270；其名字在英語中常被稱為 William of Rubruck）奉法王路易士九世（Louis IX）之命，偕同巴托羅姆（Bartholomew）教士經由黑海到伏爾加河流域，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達蒙哥的幕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再次被召入宮謁見蒙哥。魯布魯克在回到塞浦路斯後，把經歷寫成報告《東行紀》（原書名：*Itinerarium fratris Willielmi de Rubruquis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m, Galli, Anno gratiae 1253 ad partes Orientales.*），該書與柏朗嘉賓的《蒙古行紀》同受重視，而他的著述中提到景教教士和聖經，³但難以確定聖經是否已被翻譯成蒙古文或漢文。⁴

另一部著述更為出名，就是《馬可·波羅遊記》（原書名：*Livres des merveilles du monde*）。波羅（Polo）兄弟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的年代（1265年）抵達蒙古大都，他們於一二六九年回到家鄉，不久再有兩名修士跟隨

2. 柏朗嘉賓的《蒙古行紀》版本頗多，可參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Viaggio a' Tartari di Frate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Milano: Edizioni "Alpes", 1929)；英譯本參 C. Raymond Beazley (ed.), *The Texts and Versions of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de Rubruquis, as prin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Hakluyt in 1598, together with some shorter pieces (in Latin and English)*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03)；中譯本參柏朗嘉賓 (Jean de Plan Carpin) 著，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85）。

3. 關於景教聖經，參本書附錄一「景教文獻中的聖經翻譯」。

4. William of Rubruck, *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1253-1255* (trans. Peter Jackson & with David Morgan,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2009).

波羅兄弟前往元帝國，其中一人帶上了其十五歲的兒子馬可·波羅（Marco Polo, c.1254-1324）。兩位教士半途而返，波羅一家三人於一二七五年再次回到中國。馬可波羅可能在元帝國任職達十七年，他在多年之後口述的遊記，激起了整個西方對中國的遐想。書中有不少地方提到景教徒、基督徒和教會，記載蒙古可汗在節日傳召基督徒，要他們呈上四福音，並吩咐他們和朝臣公卿向這書焚香禮敬，虔誠獻吻。⁵

2. 孟德高維諾的記述

元代最直接提及聖經翻譯的史料，是來自意大利方濟會士孟德高維諾（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6-1328）的記錄。⁶孟德高維諾是中國第一個天主教教區的創始人，他在一二八九年由教宗尼閣四世（Nicolas IV）任命為教廷使節來華。他在一二九四年以教廷使節的身份抵達大都謁見元帝，獲准於一二九九年在北京設立教堂傳教，一三〇七年獲羅馬教廷委任為汗八里（今北京）總主教。孟德高維諾在寄回歐洲的信札中提到，他熟悉韃靼人日用的語言和文字（大概是指蒙古文），而且他已經以這種語言文字來翻譯整部新約與《聖詠集》。不過，這些經籍現今都已不存於世。

隨着蒙古人政權被漢人建立的明朝政府逐出中國，天主教傳教士由於新政權的閉關政策而被拒於中國的門外。

二、明末天主教的中文聖經著述

1. 明末的早期嘗試

十六世紀中葉明末之際，天主教傳教士再次來華。從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在他們的教理著述中，滲入了少量中文的聖經經文。從十八世紀至今，天主教中文譯經的數量不多，卻一直見有成果。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聖經翻譯，主要用於教會禮儀，例如在講壇上的宣講、福音信息、在日課經中的聖詠吟唱，以及對經唱頌所引用的經文等。

天主教傳教士對明代中國的接觸，始於一五五二年，西班牙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 1506-1552）抵達廣州附近的上川島，可惜

5. Marco Polo,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W. Marsde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Benjamin Colbert; W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7).

6. 孟德高維諾的信札，現存意大利佛羅倫薩的勞倫圖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關於孟德高維諾的論述，參 Pacifico Sella, *Il Vangelo in Oriente: 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frate minore e primo Vescovo in terra di Cina, 1307-1328*, prefazione di Francesco D'Arelli (S. Maria degli Angeli: Porziuncola, 2008)。另參 J. De Ghellinck, SJ, "John of Monte-corvino: First Archbishop of Peking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in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XVIII.69 (Jan., 1929), pp. 83-96。

由於明朝政府正實行封禁海疆的政策，嚴格限制外國人入境。當時沙勿略身處中國南方邊陲，仍然抱有一絲期望，可以進入閉關多年的明朝中國。然而，沙勿略始終未能如願。就在同年十二月三日，沙勿略因瘧疾病逝於島上，年僅四十六歲。⁷

雖然沙勿略未能如願而逝，但他對中國福音化的理想，卻影響了後來的天主教傳教士。以後，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 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等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奠定基礎。這群以耶穌會為主的來華傳教士，以中文撰寫和翻譯了不少天主教教義著作。不過，他們大多僅在個別著作中摘錄了部分聖經經句，而沒有完全翻譯聖經。羅明堅於一五八四年在廣州刊行的《天主聖教實錄》，就是首部天主教要理中文著述，其中涉及天主教教理之處，即有經文的摘引。

早期耶穌會士的著述，既把西方天主教教理介紹，也創譯了許多基督教用詞的中文翻譯。例如，近期研究認為「十字架」一詞即為早期耶穌會士所創，羅明堅的著述有提及，而這個用詞的創始者可能是沙勿略。⁸

明清基督教傳教士在創制漢語新詞的貢獻，以及他們在漢語詞滙學史上之地位，應該受到更多探討。不過，當時耶穌會士的中文著作大多為闡釋教會的基本要理和神學，例如三一、原罪、救恩等。相對之下，對於經文摘引的數量並不算多，而且大多經文是經過摘錄和修飾。

2. 天主教翻譯聖經經文的方式

在明末清初對於聖經的翻譯，主要是出現在類似的教理書籍上。⁹大體上，這些作品可以按其使用方式分為三類：

一、聖經史實的描述：例如西班牙耶穌會士龐迪我 (Didacus Pantoja) 的《受難始末》(日期不詳，1925年土山灣有重刻本)、艾儒略的《天主教降生言行紀略》(1642年初刻於北京，共八卷)等。

7. 關於方濟各·沙勿略的生平和書信，英文著述可參 Henry James Coleridg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t. Francis Xavier* (2 vols.; London: Burns and Oates, 1872)，書中載有至一五五二年沙勿略的書信。

8. 參莊欽永、周清海，《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10)，頁 108-109。

9. 明清天主教來華傳教士文獻的彙集，包括上述經籍的印本，主要見於學者(特別是方豪神父)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整理的著述，包括：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3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6)；吳相湘編，《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6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4)；鍾鳴旦(Nicholas Standaert)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5冊；台北：方濟出版社，1996)；鍾鳴旦、杜鼎克(Adrian Dudink)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2冊；台北：利氏學社，2002)；鄭安德編，《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及文獻彙編》(5卷；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鍾鳴旦等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6冊；台北：利氏學社，2009)；周岩編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資料新編》(3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二、聖經經句的摘引和詮釋：例如利瑪竇的《天主實義》（1595年初刻於南昌）、陽瑪諾的《天主聖教十誠真詮》（刊於1642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Ludovico Buglio）散見於不同書中的中文聖經譯文等。

三、教會禮儀經文：利類思翻譯過不少彌撒經書和祈禱書，載錄了中文的經文，例如《彌撒經典》（1670年印共五卷）、《司鐸日課》（1674年刻於北京）、《聖母小日課》（1676年刻於北京）、《已亡日課經》（日期不詳）等。

上述書刊中的聖經經文，不一定是按嚴格的方式翻譯，而是以中文（特別是文言）闡述聖經歷史和故事的演繹，以及關注聖經對教會禮儀的應用，例如講壇宣講、福音信息、在日課經中的聖詠吟唱，以及對經唱頌所引用的經文等。¹⁰

耶穌會士翻譯或摘引聖經的作品¹¹

主要著者／譯者／編者	著作
陽瑪諾（Manuel Dias Junior, 1574-1659）	《聖經直解》8卷（1642）、《聖若瑟行實》、《輕世金書》4卷（1640）、《天主聖母暨天神聖人瞻禮日解說》
陽瑪諾、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費奇規（Gaspar Ferreira, 1571-1649）、傅凡際（Franciscus Furtado, 1587-1653）、費樂德（Rodrigue de Figuerdo, 1594-1642）同訂，南懷仁重訂	《總贖會要》
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 ¹²	《古新聖經》
羅雅谷（Giacomo Rho, 1593-1630）著，李天經潤色，韓雲校梓	《天主經解》1卷
殷弘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 ¹³	《主經體味》8卷、《莫居兇惡勸》、《忠言逆耳》

10. 參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p. 31-54。

11. 下表整理自徐宗澤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17-104，「卷二 聖書類」的簡介。

12. 關於賀清泰的譯經，參本書第一部1.3章。

13. 關於殷弘緒的譯經，參本書第一部1.2章。

利類斯 (Lodovico Buglio, 1606-1682)	《彌撒經典》、《司鐸日課》(1674)、 《司鐸要典》(1676)、《聖事禮典》 (1675)、《聖母小日課》(1676)、 《已亡日課經》
龍華氏 (Nicolas Longobardi, 1559-1654)	《聖教日課》3卷(1602)、《念珠默想 規程》、《聖人禱文》、《聖若撒法行 實》
費奇規	《振心總牘》、《新刻主保單》
利國安 (Giovanni Laureati, 1666-1727)、龔寶全訂，陽瑪諾 准	《煉靈通功經》
畢多明我、德瑪諾閱訂	《顯相十五端玫瑰經》
許鼎、金元聲	《超性俚吟》(1739)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天主降生言行紀略》8卷(1642)、《口 鐸日抄》(署名「思及艾」)
馮秉正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	《聖年廣益》(1738)、《盛世芻蕘》、 《朋來集說》、《聖體仁愛經規條》(1719)
高一志 (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聖母行實》(1631)、《聖人行實》 (1629)、《十慰》、《神鬼正紀》、 《則聖十篇》
聶仲遷 (Adrien Grelon, 1618-1696)	《古聖行實》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崇一堂日記隨筆》、《真福訓詮》
魏繼晉 (Florian Bahr, 1706-1771)	《聖若望臬玻穆傳》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	《德行譜》(1726)、《濟美篇》
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七克》(1604)、《龐子遺詮》4卷
穆迪我 (Jacques Motel, 1618-1692)	《成修神務》3卷
林安多 (Antonio de Silva, 1654-?)	《崇修精蘊》(1783)
李九功	《勵修一鑒》(1639)
陸安德 (Andre-Jean Lubell, 1610-1683)	《善生福終正路》、《真福直指》

羅雅谷 (Giacomo Rho, 1593-1630)	《哀矜行詮》、《死說》、《求說》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善惡報略說》 (1670)
周志	《身心四要》 (1649)
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1651-1729)	《人罪至重》 (1698)
郭納爵 (Inacio da Costa, 1599-1666)	《原染虧益》
佐勤、陸思默	《臆說》
潘國光 (Francesco Brancati, 1608-1671)	《天階》、《瞻禮口鐸》
九章先生、潘用觀	《口鐸合鈔》
陸思默	《周主日觀禮口鐸》
熊士旂	《策怠警喻》
蘇霖 (Joseph Suarez, 1656-1736)	《聖母領報會規》 (1694)
作者不詳／佚名	《仁會約》、《天主審判明證》、《周年瞻禮單》

3. 陽瑪諾的聖經翻譯

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傳教士曾將部分聖經經文翻譯，其中以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 (Manuel Dias Junior, 1574-1659, 另稱 Emmanuel Diaz) 的譯文最為早期和豐富。

陽瑪諾，字演西，葡萄牙耶穌會士。一六〇一年在印度果阿完成學業後，到澳門教授神學六年。一六一一年入廣東韶州傳教，一六一六年因南京教案謫居澳門。一六二一年被派往北京，一六二三年被任命為中國副區長，曾在南昌、南京、松江、福州等地傳教，一六五九年死於杭州。

陽瑪諾在聖經經文翻譯的成就，尤其見於他對十誡的譯述，以及《天主降生聖經直解》(簡稱《聖經直解》) 兩部著作。

十誡的經文見於《出谷紀》(20:2-17) 和《申命紀》(5:6-21; 34:11-27)，不過在上述經文中沒有清楚界定如何區分十誡。奧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 參考猶太教的傳統，但把《出谷紀》二十章 2-6 節視為第一誡，而把 17 節劃分為兩誡。這方式稱為「奧古斯丁分法」(Augustinian division)，為羅馬天主教會所接受。耶穌會士的十誡，即按這原則劃分。

耶穌會士的著述對十誡的摘引，按上述基礎而概分。早期耶穌會士引

用十誡的著述，包括有羅明堅的《天主實錄》（1548）、王豐肅（Alfonso Vagnoni，即「高一志」）的《天主教要解略》（1615，即《天主十誡解略》）、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滌罪正規》（日期不詳）、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的《天主十誡勸諭聖蹟》（1654）和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的《教要序論》（1670）。¹⁴在上述書刊中，都沒有對出谷紀和申命紀有關十誡的經文作出完整的翻譯，而是簡述十誡的要旨，然後作出注釋或引論。

陽瑪諾的《天主聖教十誡直詮》也是一樣，詳盡解說十誡的意義，不過沒有把《出谷紀》和《申命紀》的有關經文翻譯出來，所以這些著述雖然解說了十誡的意義，卻不是對聖經的直接翻譯。

《天主聖教十誡直詮》分為上下兩卷，在卷首注明「上卷論前三誡上愛天主 下卷論後七誡下愛世人」。在書中有關十誡的條目如下：¹⁵

- 一 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
- 二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
- 三 守瞻禮之日
- 四 孝敬父母
- 五 毋殺人
- 六 毋行邪淫
- 七 毋偷盜
- 八 毋妄證
- 九 毋願他人妻
- 十 毋貪他人財物

除了十誡之外，天主教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中文新約聖經節譯，由陽瑪諾完成。這部作品名為簡稱《聖經直解》，是主日福音經文的中文翻譯及注釋。¹⁶陽瑪諾在一六三六年完成了四福音的中文翻譯，《聖經直解》按照一年中主日所用的聖經經文，加上注解和箴言，而其經文是譯自十六世紀通行的天主教拉丁文聖經（Latin Vulgate Bible），附有詳盡的注釋，對於

14. 關於明清天主教傳教士對十誡的翻譯，參柴田篤，〈明清天主教における十誡：「愛天主・愛人」の概念を通して〉，載《中國哲學論集卷号》（九州：九州大學中國哲學研究會，1996），頁35-54。

15. 本書多次重印，以下引述者為一七九八年的版本。

16. 陽瑪諾的《聖經直解》有近代刊印的版本，見於《天主降生聖經直解》（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2）。另有刊本印於一九八四年台灣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第四至六冊。

聖經的內容有廣泛的介紹。《聖經直解》在一六三六年北京初刻本十五卷（不同時期的卷數不等），把福音書許多經文譯成中文。此書附上索引，中文書有索引當始自此書。《聖經直解》另有官話節譯本，題為《聖經淺解》。《聖經直解》對清初天主教的譯經有一定的影響。¹⁷

以《聖經直解》第一卷（1636）首段為例：

天主。西土原文曰陡斯。乃天地萬物之主。是自有者。至神無形。無始無終。常活常王。無所不在。萬善萬福。渾然全備。無以尚之。未有天地之先。獨有此一天主。以其全能。從無物中。造成天地人物。而常為之宰制。保護開引。

三、近代天主教譯經

1. 清初至民初的嘗試

現存最早期的天主教中文聖經譯本，是十八世紀初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 士白日昇 (Jean Basset, c.1662-1707) 翻譯的新約部分，以及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 (Louis Antoine de Poirot) 在清初從拉丁文譯成的官話《古新聖經》。這兩部早期中文聖經是按照拉丁文聖經的忠實翻譯，不過都沒有出版通行。在同期有另一部聖經單卷譯本，即一七三〇年由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 (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在北京出版《訓慰神編》，附有《多俾亞傳》(Book of Tobias)，在譯文中有所增刪，提供中國讀者可以理解的解說。這是中國天主教會第一部出版的聖經單卷版本，藉此對信徒生活有所論述。儘管上述聖經譯本沒有被出版，或流通量並不多，但對於天主教的傳教工作（甚至十九世紀初新教來華傳教士的聖經翻譯）卻有影響。

明清兩代天主教傳教士譯經的數量不多，而且大多是私人的譯本，只有聖經部分的翻譯，以作參考，甚少流傳。據說，在十八世紀初，方濟會士梅述聖 (Antonio Laghi da Castrocaro, 1668-1727) 翻譯了《創世紀》和部分《出谷紀》，另一名方濟會士麥傳世 (Francesco Jovino, 1677-1737) 修訂了上述部分譯文，並且翻譯至《民長紀》（顯然也包括《多俾亞傳》與《達尼爾》），但他們的譯本沒有出版或保存。到了十九世紀，中國教士也有

17. 參竹中憲一，〈漢譯聖書「聖經直解」と「四史攸編」について〉，載早稻田大學《人文論集》29 (1991)，頁 35-52；塩山正純，〈カソリックによる聖書抄訳 デイアスの「聖經直解」〉，載《文明》21 (2008)，頁 57-77；余雅婷，〈「聖經直解」と「古新聖經」による聖書翻譯の繼承關係 — 福音書の「マタイによる福音書」を中心に〉，載《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9 (2016)，頁 83-94。